会 员 通 讯

2015 年第 6 期

（总第 50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5 年 7 月 31 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国经中心与澳大利亚、法国、韩国有关机构举行签约仪式 ……（3）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在京发布 ……（4）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提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新路径的核心 ……（7）

《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 年后中国和 G20 面临的机遇》成果在京发布 ……（10）

《从中国到全球：寻找可持续发展新航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在京发布 ……（12）

国经中心举行“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新闻发布会 ……（14）

权威言论

曾培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6）

张晓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高度专业化和机制创新 ……（19）

郑新立：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 ……（27）

魏建国：历史将考验大国智慧 ……（32）

萨金特：第四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媒体联合采访 2011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 ……（40）
阿德南：第四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媒体联合采访国际能源署前署长阿德南·阿明 ……（48）
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
李克强会见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并座谈 ….（58）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 刘延东出席并致辞 ……（60）
凝聚全球智慧和力量 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 ……（61）
光明日报：
智为国所用 策为民而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书写中国智库动人故事 ……（65）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论坛：减贫与增长的全球治理之道 ….（74）
立足中国 研究中国 为了中国——中外智库专家建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77）
成果摘要 ……（84）
国际交流 ……（97）

[工作动态]

国经中心与澳大利亚、法国、韩国有关机构举行签约仪式

6 月 27 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安芳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彼得·特莱斯戴尔代表双方所在机构，签署中澳经济关系联合研究合作协议。该研究旨在中澳 FTA 签署后，对经贸领域中长期发展前景并提供政策性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表示，“中澳经济互补性强，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特别是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为中澳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相信两国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将为未来十年中澳经济关系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霍奇表示,“澳政府深切认识到澳大利亚对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这项联合研究工作将为“澳方深入了解中澳经济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特蕾莎·里贝拉签署双方机构开展亚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合作协议。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还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李一衡院长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上述合作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国际知名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在京发布

6月27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京发布。《宣言》发布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作为主要发布人,介绍了《宣言》主要内容。



一、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是一次全球智库思想和智慧激荡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智库代表、专家、学者和前政府高官等参加了本届峰会，体现了全球智库峰会“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

二、本届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新路径”为主题，围绕八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分析了近年来全球经济状况和其后的发展趋势，对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内容提出了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本次峰会深化了认识，扩大了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三、联合国在世纪之交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普及小学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饮用水安全、降低儿童死亡率等主要目标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全球解决发展不平衡、大量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等任务依然很重，发展仍然是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和主题。全球应

继续聚焦最贫困人口，将减贫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点。应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水平、加强教育与技能培训、发展面向贫困群体的小微金融服务等措施，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等比较优势和发挥民众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采用“以工代援”等多种方式，更有效解决减贫问题。

四、全球经济发展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并不能因此而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减排温室气体、环境保护，还是经济转型，都应当在推动发展、实现减贫的基础上进行。应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增长；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等措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各国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调整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技术合作和转让、增加资金投入等途径，提高节能减排水平。

五、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复杂变化和深刻调整，我们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对治理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措施进行了反思，对其效果进行了分析，这将对化解和预防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会议认为，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效率不够高、协调性不够强、规则不够合理等问题，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治理平台在危机治理、全球共同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形成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企业界和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协调合作的机制。更加尊重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

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建立更加平等均衡、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六、智库在解决和处理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有待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共同性重大挑战增多，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包容互鉴的大环境下，各国智库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区域和平发展环境、引导国际舆论、凝聚人类智慧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会议希望，各国智库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自身能力，加强与政府、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并加强多种方式的智库交流合作，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共同发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提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路径的核心

6月26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了开幕式。峰会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主题展开广泛深入讨论，提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路径的核心。

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所确立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和联合国的一大创举，代表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流。15年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取得

了可喜进展。然而，千年发展目标落实情况很不平衡，地区之间进展也存在很大差距，促进未来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联合国正在筹划提出“2015 年后发展议程”，本届智库峰会旨在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性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前会见了与会外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书面致辞。来自国内外知名智库、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代表 8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坦诚交流思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开幕致辞中指出，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美好未来期待的增长。后 15 年的目标必将迈上新台阶，内涵也应不断拓展和充实。人类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消除贫困无疑还应作为主旋律，以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与此同时，还应更加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就对国际社会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各项工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包容发展、绿色发展新模式。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落实者。在国内，提前实现了减贫目标，探索了一些有效做法，譬如基础设施先行、开发式扶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员社会资源扶贫等，我们愿与各国交流分享这些经验。2013 年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期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推动具体务实行动，对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国际法教授、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新西兰前副总理唐纳德·麦金农，波兰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副总理格热戈日·科沃德克，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田中伸男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本届峰会平行综合论坛上将讨论“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消除贫困”、“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话题，60 多位专家将发表了精彩演讲。六个平行专题论坛将分别围绕“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变革”、“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全球可持续发展：品牌的打造”、“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等议题，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和智库人士将展开深入讨论。

全球智库峰会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打造的一个重要论坛，旨在打造全球智库思想交流平台。首届峰会 2009 年举行，每两年举办一次，前三届分别以“全球经济复苏和展望”、“全球经济治理：

共同责任”、“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探讨当今世界重大议题。峰会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汇集了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院、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中外顶尖智库参会，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智库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当今世界，发展仍是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和改善民生仍是第一要务。2015 年后发展议程应该继续聚焦于世界最贫困的群体，继续发扬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精神。因此，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新路径”，旨在探讨新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以供联合国参考。本届峰会将发布《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 年后中国和 G20 面临的机遇》、《从中国到全球：寻找可持续发展新航标——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研究成果，形成并发布《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 年后中国和 G20 面临的机遇》成果在京发布

6 月 26 日，《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 年后中国和 G20 面临的机遇》成果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发布。该成果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所共同完成。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诺德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共同发布研究成果。发布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主持。

报告指出，中国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的轮流主席国，应将发展作为G20峰会的议题，并制定以发展为中心的议程。

报告认为，在实施2015年后议程中的全球经济治理、经济发展潜在挑战、地缘政治局势、全球环境恶化等，将一个不安全感持续上升的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新的形势下，南半球的力量正在崛起，随着南南合作，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东盟10+1、欧盟与亚欧会议、南方共同市场等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快速发展，世界格局正在深度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组织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G8）、G20等仍存在诸多缺陷。在通过改革支持发展方面，联合国在后2015年时代应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报告建议，中国应通过改善刺激经济的政策，加大在基础设施与可持续产业上的投入力度，同时支持G20成员国加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推进绿色经济。从促进发展方面，中国可以鼓励G20国家采用税收优惠、社会政策倾斜以及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内发展计划来推进平衡包容的双赢增长，并鼓励G20国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应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与现有的国际性、区域性金融机构间建立统一协调的关系。

《从中国到全球：寻找可持续发展新航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在京发布

6月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合作共同完成的《从中国到全球：寻找可持续发展新航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在北京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发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张大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执行院长斯蒂夫·科恩教授出席了发布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郭栋博士分别代表双方课题组介绍了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认为，人类前进的足迹伴随着大量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和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尤其对中国来说，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已经成为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然性问题，可持续发展形势相当严峻。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管理之间的有效平衡，怎样有效达到三者的平衡，迫切需要一套简约的指标。

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课题组构建了一套新的测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由5个主题和87个基础指标构成。五个主题分别是：社会福利、资源与环境、人类影响、可持续治理和稳定增长。其中可持续发展中最常见的三个主题社会（社会福利）、经济（稳定增长）和自然（资源与环境）都被包含进来，在

此基础上，针对自然主题，增加两个因果或者关联主题：人类影响与可持续治理。这相当于一个自然资产负债表。环境与资源描述的是自然存量，人类影响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是自然存量的减少；可持续治理是人类社会为治理和保护大自然所做出的努力，是自然存量的增加。社会福利的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断改善又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稳定的增长是保障社会福利、可持续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在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架时，一是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应对全球变化这个全球共同性问题上，特别是在衡量指标的目标设定上，需要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二是着眼于从“效率控制”到“容量控制”，建立起一整套与之配套的指标和绩效考核体系，需要将现行的标准控制向总量、质量和容量控制渐次推进；三是尽可能兼顾“可持续性生产”与“可持续性消费”，以充分反映随着中国经济内需型转型和持续中高速增长，消费端面临的生态压力将逐步增大这一基本事实；四是坚持“增长”和“治理”两轮驱动，以体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治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核心主题；五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包含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稳定的增长，也考虑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环境和保护；六是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不仅着眼于当前能够做、必须要的事情，同时也要放眼未来，考虑一些将来可以做、应当做的事情。

在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主要设计了五大主题。一是社会福利指标主要反映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教育文化、社会公平、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二是资源与环境指标包含数量、质量和环境，具体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耕地、矿产、海洋、淡水等，以及自然保护区、城市环境等的状态，促进从数量、质量和环境系统方面坚守生态红线；三是人类影响指标主要反映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与生产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由资源的消耗、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等三个方面组成；四是可持续治理是实现人类对自然正影响的主要手段，包含了全社会的决策与行动，包括治理资金上的投入、主要环境治理目标的设定；五是经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稳定的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国经中心举行“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新闻发布会

6月3日上午，国经中心召开“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信息部副部长王军主持，魏建国副理事长介绍了会议主题和相关背景。来自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瞭望》、第一财经、中国网、等二十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发布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于2015年6月26-27日在北京举办。今年中央政府准备制定“十三五”规划，又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一年，今年底世界气候大会将在巴黎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了发挥智库作用，配合国家整体经济外交工作，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确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重点讨论减贫、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以便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大会提供政策建议。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由开幕式、两个综合分论坛和六个专题论坛组成。综合论坛一为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综合论坛二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专题论坛一为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专题论坛二为国际金融危机和可持续发展，专题论坛三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变革，专题论坛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专题论坛五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品牌的打造，专题论坛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会议将邀请政府、企业、智库、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专家人士参会，发表真知灼见。国经中心还将在年会上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魏建国副理事长希望媒体以创新的方式报道此次峰会，从事前、事中、事后做好报道工作，起到应有作用。发布会上，他还对记者关心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权威言论]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事长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00 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所确立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在世纪之交的一大创举，代表了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主流。这一目标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5 年来，国际社会付出了不懈努力。今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应该说，各项任务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还不很平衡，地区之间的进展也存在较大差距，促进未来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现在联合国正在筹划提出“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旨在指导今后国际社会的演进。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美好

未来期待的增长，后15年的目标必将迈上新台阶，内涵也应不断拓展和充实。人类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消除贫困无疑还应该作为主旋律，以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所说，要“让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还应更加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就对国际社会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各项工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包容发展、绿色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践行者。在国内，提前实现了减贫目标，探索了一些有效做法，譬如基础设施先行、开发式扶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员社会资源扶贫等，我们也愿与各国交流分享这些经验。中国正在制定下一个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增进民众福祉，实现全民全面小康目标。在国际上，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期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推动具体务实行动，对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国千年宣言》使无数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曙光。我真诚希望，“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继续普照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们过上更加安全、更加平等、更加绿色、更加美

好的“有尊严的生活”；推动世界更加持续、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愿意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尽责地提供智力支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高度专业化和机制创新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

导言：能否有效影响决策，是对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戴芊

智库的历史由来已久。门客、军师、谋士等可以说是最早的智囊，他们在古代军事及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说的就是智囊团的重要性。

现代智库则起源于二战期间，美军组织一批参谋、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对外保密。当时，美军把这个机构命名为“Think tank”，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发展到现在，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也在逐步提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对于中国的智库而言，现在无疑是发展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的智库现状如何？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兼执行局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详细阐述了他对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

何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小标题）

《财经国家周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时指出，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你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张晓强：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特点要把握。通过过去多年努力，中国也有了一批智库机构，包括一部分体制内的，比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都是正部级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也有智库研究中心，比如上海社科院，已经被列入中国智库100强。同时，很多部门的研究室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内设的小智库。另外，还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高校的研究院所。

但整体上来说，体制内的智库机构都比较偏重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和宣传，相对独立的、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较少，能提出创建性、独立建议的也较少。另外，由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比较多，机制导致这些智库机构行政化特色比较突出。加上财务纪律的约束，创新性以及更加开放活跃的讨论相对都较弱。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决策水平，需要我们的智库更好地参与国家决策，更好地进行前瞻性研究，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具有战略性眼光地来提出建议，更好地对社会不同界

别进行沟通了解。

所谓“新型智库”，我个人认为:第一，智库形成的研究报告里既要有宣传解读政策的这一面，也能了解各方各面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政府决策，或者各方各面的规制建设、政策制定方面。

第二，相对应的，整个政府职能在转变，不能靠不断增加政府投入来支持智库发展。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要有个更宽松的环境，在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前提下，民间、企业、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各有特色的智库，形成一个门类更齐全，各具特色的智库体系，发挥好积极作用。

第三，目前市场配置资源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管理机制上也要能够适应这种环境。智库自身管理的科学化、可持续发展，以及自身造血机能的完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下个阶段要着力努力的。

《财经国家周刊》:《意见》指出要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如何定义“专业化高端智库”？

张晓强：专业化相对好理解。在特定的领域内，研究水平比较高，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或被政府机构采纳，或被大企业集团采纳，或被行业协会采纳等，能够提出一定的有效的思想成果。这跟企业专业化发展有点相似，不能都是一个模式，或者都

只研究某一个热门领域，要适应市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做全能型智库。

如何判断高端，从美国智库的经验来看，虽然智库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但他提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很多人认为，能否有效影响决策，是对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各界都在研究中国会不会发兵，五角大楼委托兰德公司做了一个咨询报告，兰德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会出兵。其他大多数主流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不会出兵。最后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判断就是以中国不会出兵做部署安排，所以，中国出兵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

再比如，在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打得很惨，很破败，跟苏联的矛盾也在激化，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应对这样的局面？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来的建议是加大援助力度。第一，美国在战时形成了很庞大的生产能力，战争停止后出现产业供给过剩及失业。这样可以减轻美国压力；第二，欧洲是盟友，发展美欧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三，可以遏制苏联扩张。这个建议最后被美国政府采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看，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成功的战略。

最近，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美国一个研究机构首先提出的。

当然，在新常态下，怎么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怎么能够反映民意，使得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协调融洽，也是智库高端化的一个表现。

民间智库如何影响决策（小标题）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与我国经济规模的成长尚成正比。但就影响力而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最靠前的排名是第20位。如何改进这种广而不精的智库现状？

张晓强：改变广而不精的现状跟正在推进的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很多行业部门撤了，摇身一变成为行业协会。比如没有冶金部了，变成了钢铁工业协会，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社会团体，还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带有“二政府”的性质。类似这种大协会有100多个，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它下边还有一些社会团体，还属于事业单位。

去年，国经中心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所谓智库有2000多个，你们说的426家是美国宾州大学的调研数据。实际上，有的机构就几个人、一两个研究员，就说自己是高端智库；更多的是开个什么论坛，挣点会议费，他们其实更像公关公司。

智库今后的发展会更加市场化，一个领域允许几个协会或者社会团体，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智库发展也得遵循市场规律，不能靠

行政命令。如果说建设高端智库需要有选择，有政府部门通过科学评价机制确定，但对上千个智库，更多的得引入市场淘汰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目前有很多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怎么去反映民意，从而起到影响决策的作用？西方高端智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或制度？

张晓强：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在要加强探索的一个问题。现在各种智库机构，如何能把自己了解的民意，或者对政策形成的前瞻性判断让政府采纳，发挥积极作用呢？

首先渠道很重要。至少要先进入到决策层的视野，才能知道你的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现在渠道正在逐步完善，新媒体就是一种方式。如果点击率高，中央领导人很快就能看到。

据我所知，体制内的一些智库也很重视收集新兴媒体或者社会的意见。我原来在发改委工作，发改委以各种方式向国务院报送政务信息，除了各司局报，国家信息中心每天采集大量的网络信息，把有价值的挑出来通过发改委往国务院报。民间智库有时候也能形成一些建议报告直接往上送，或者是公开发布。

西方智库有一个旋转门制度。很多智库重量级人物经常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隔一段时间后又从政府机构出来，这样它递送报告的渠道就非常畅通。比如基辛格之前是大学教授，卸任美国国务卿后成立基辛格研究所，他跟白宫的电话都是畅通的，他们出的研究报告很快就能直接到总统手上，甚至有时候总统会主动打电话咨询，

甚至不时见面讨论一下。

现在有些人提出在中国借鉴这种做法，但这可能要有个过程。现在有多种方式让不同界别的人直接进入管理岗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通过政协的参政议政渠道，让各界人士，包括智库机构的人士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政府机构的人到智库任职，智库推荐的人到政府机构任职？这方面还有个探索的过程。

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民间共识（小标题）

《财经国家周刊》：国外很多顶级智库机构背后的资金支持是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如何解决资金与智库发展以及权威性之间的问题？

张晓强：智库肯定需要资金支持。美国的很多智库是有大财团支持的，或者各种基金会支持。经过多年积累基金会已经很强大了，用基金的本金去做投资，用收益支持日常运行，形成一种有力的机制。还有的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你做得越好，政府越愿意付费委托你做研究。

对于体制内的中国智库来讲，更重要的是资金使用怎么能更高效。比如说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现在社科院也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好，基本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对于社会化的智库来讲，需要企业捐助，所以要给予企业一些税收优惠。现在政府只对慈善基金会捐助免税，在智库基金这方面没有优惠，不能税前列支。相应的智库收到资金进行有效运作产生的收益也涉及到交税的问题。

这方面能否考虑在中国智库发展初期阶段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顶尖智囊团体系构建成熟后，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有怎样的实质意义和推动？

张晓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一旦这种智库体系构建完善后，对国家能力提升，智力体系完善将会有巨大推动作用，科学决策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进来了，纳入到国家整个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这种智力体系不仅为决策提供支撑，同时为凝聚民间共识，下情上达促进社会和谐都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目前学界的判断仍存在一定分歧。一种观点仍然主张要谨慎使用货币政策，因为目前经济还处于产能出清、去库存的阶段，如果盲目进行货币刺激，可能使这个过程功亏一篑，短期经济数据会有起色，但最终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可能损害金融体系的健康。而且，目前的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也不必采取宽松货币的刺激政策。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形势比较严峻，目前正在陆续公布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状况。而这种严峻形势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力度不够有关系。下面这篇来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的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这并不代表本报的立场，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参考。

与目前是否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相比，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或许同样迫切，因为前期的降准降息已经使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大幅降低，但是实体经济的需求不足，银行的资金并未获得充分利用，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并没有明显下降。

郑新立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后，4 月 30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这是对当前经济运行主要风险做出的正确判断，是对当前宏观调控主要任务做出的重要部署。我们应当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来统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三年多时间。今年一季度，GDP 同比增速降为 7%，财政收入增速降为 3.9%，工业企业利润减少 2.7%。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5.9%，出口增长 6.2%，CPI 降为 1.5%，PPI 已连续 38 个月为负。1-4 月，新开工建设项目投资增长率为零，4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 7%。尽管就业情况仍比较好，整个经济运行仍处于可控范围，但一些脆弱的行业和企业，如煤炭、钢铁、房地产和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运营困难加大，孕育着破产和金融不良资产增加的风险，显露出经济形势严峻的一面。统计数据已经说明，需求不足已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经济下行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通货紧缩则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风险。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选择。

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职能上，财政政策主要是管结构，货币政策主要是管总量的。因此，实施扩内需、稳增长的政策，主要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近 4 年多来，我们实际上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说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适度从紧？只要我们把近四年多的广义货币 M2 的增长速度与之前 20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一

个对比，就会一目了然。1991-2010 年的 20 年间，我国 M2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0.5%，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3%，M2 的增速为 GDP 增速的 2 倍。这是我国经济的长期实证数据，与国际历史上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国家的数据是一致的。国外经验证明，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M2 的增速保持在 GDP 增速的 2 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高于 2 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低于 2 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美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发现和论证了这一规律。笔者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两次赴美，向他请教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他亲口告诉了我这一研究结果。他说这是他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在快速成长期的统计数据中得出的规律。中国 20 年的统计数据，再次验证了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正确的。

反观近 4 年多来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及其影响：2011-2014 年，M2 的年增速分别为 13.6%、13.8%、13.6%、13.0%，年均增速为 13.5%，比此前 20 年的年均增速下降了 7 个百分点；随之 GDP 的年增速分别为 9.3%、7.7%、7.7%、7.4%，年均为 8%，比前 20 年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今年 1-4 月，M2 的同比增速降至 10.1%，比 1991-2010 年的增速下降了 10.4 个百分点，比前 4 年的增速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根据经验，货币增速对经济增速影响的滞后期为半年，去年特别是今年前 4 个月货币增速进一步下降，必将在下半年和明年显现出来。应当说，前四年多 GDP 的增速没有降至 M2 增速的二分之一，是大力推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

应当看到，当前经济下行已经形成一定的惯性。由于企业形成了经济下行的不良预期，制约了投资的积极性。今年前 4 个月，社会融资总规模仅增加 5.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 1.5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同比仅增长 6.5%，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 5.5 个百分点。企业缺乏投资意愿，银行贷款用不出去，以致不久前人民银行向部分金融机构进行定向正回购，回收了超过 1000 亿元流动性。经济下行惯性助推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加剧经济下行，如此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当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政治局 4 月 30 日会议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克服经济下行惯性，使货币增速有一个大于正常情况下的增长速度。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常常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率较高为由，主张降低货币发行的增速。截至 2014 年年底，我国 M2 即货币和准货币总量已达 122.8 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3.6 万亿元的 193%。在国际上，这个比例因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我国的这一比例与某些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判断一个国家货币化率是否合理，关键应看货币供给量能否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只要不造成通胀或通缩，货币供应都应当视为合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经济货币化率高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偏低，企业对间接融资的需求较大，必然要求有较高的货币化率。发达国家股市市值总额一般相当于 GDP 的 100%左右，而我国长期仅为 40%左右，最近几个月才上升

到 50%以上。在判断货币供给总量是否合理时，只看经济的货币化率，不看经济的证券化率，只能得出错误结论。因此，对于目前 193%的货币化率，不应过度担忧。相反，在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的背景下，M2 的总量已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是人民币的强大支撑。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经济仍处于快速成长期，M2 的增速保持在 GDP 的增速的 2 倍左右是必要的，既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同时，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存量的调节，更需要增量的调节，这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当前在货币政策上实施降息降准，适度扩大货币发行，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正确举措。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银行贷款大量流入股市，制造资本泡沫，需要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引导。我国债务率偏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应扩大长期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通过财政资金的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投向，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国家发改委近期推出总投资额近 2 万亿元的 7 个工程包，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应主要投向这些领域，以达到优化结构、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为防止企业挪用信贷资金炒股，应加强对资金流向的跟踪监察，确保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过去曾实行过的点贷、窗口

指导等成功经验，现在依然有效。我国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我们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如果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就出现增长乏力，那就一定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没有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

（来源：2015 年 6 月 12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历史将考验大国智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于 2015 年 6 月 26-27 日在北京举办。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专家学者、智库代表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的新路径”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全球智库峰会”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创的国际化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中国新型智库的代表，将各国的著名智库请到一起，围绕国际热点话题进行高峰对话。“全球智库峰会”每两年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次，这也是自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迎来的首次“全球智库峰会”。本次峰会有何亮点值得期待？中国网为此专门访问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为 “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的新路径”，是出于怎样的背景？有何现实意义？

魏建国：联合国已经推行了很长时间的“千年计划”第一阶段到2015 年告一段落，千年计划最主要目标就是扶贫和减少贫富差距。到 2015 年以后，世界到底往哪儿走？

第一，当前全球的最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可持续。发展仍然是解决当前整个全球所有问题的关键之关键，所以 2015 年之后，下一步全球的整体聚焦点放在什么地方，这是各国智库都很关心的。

第二，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全世界的大事，如何通过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互联网运用、中美合作等来进行环境保护和发展绿色经济是这次全球智库峰会需要讨论的，这个议题也会联系到年底的全球气侯大会。

第三，中国即将进入“十三五”，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使各国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最后到责任共同体，通过中国的不断的发展，继续做世界发展的引擎，这是本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背景。

因此，在联合国大会、全球气候大会、“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之前举办“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主题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获得新途径”，下设“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和“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两个平行主论坛。

全球智库峰会是否起到了一个全球性平台的作用？让国外智库

来了解中国的意愿和模式，共同寻找解决思路。

魏建国：基辛格曾说过，全球的智库，无论是企业的智库，大学的智库，政党的智库，国家的智库，都依附着政党、国家、企业。

所有的智库都是出思想产品的，思想产品如果是对立的话，今后各国采用对立的思想产品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就是人类的智慧，大家来共享，每个人都有好处，但是不搞对立。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绝对不是像有的专家讲的“大陆的板块碰撞”，我认为是融合，利益的融合，命运的融合，责任的融合，在这种过程中应该看到中国走的比较好。一个守成的大国跟一个新兴的大国不是一定要通过战争，更不是要通过激烈的冲突来解决之间的矛盾。

美国智库这次来的特别多，他们一方面想听听全球的事情，第二更想听听中国智库的声音。“全球智库峰会”就像一个茶馆，大家在一起交流市场信息、社会信息、共同研讨。各国智库带着各自的态度到这儿来了解对方，试探对方，同时也在摸索对方，共同来寻找解决的路子。

大家的目标一致，就是2015年以后全球到底怎么走。全球的智库到这儿来谈，各国都发表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甚至理念和对全球看法不同，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2015年以后解决全球的一些共同性的矛盾问题。

本次峰会的议题设置是一大亮点，为何选择这几大话题？

魏建国：首先，我们将“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作为峰会的第一个主题，因为当前经济的不平等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最终在全球的水平上面得到体现，一些小国还在遭受着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倾听。另外，我们应该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让大家都能受益和共赢，不是单纯的零和游戏的博弈，所以“包容性增长”就要仔细地研究，不能排斥其他人，要有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要有一个全球利益的考虑。“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没有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个分论坛主体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的监管，金融的改革。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事情，发达国家更要做。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监管不好，IMF 和世界银行的金融改革还在进行，这需要全球智库的共同讨论。另外，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气候变化、结构调整等问题，中国正在提升加大自己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中国人在外购买力强大，对国际经济发展都有巨大作用。

第三个是“全球能源变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变革涉及到各个国家，各国如何应对？如何发展利用清洁能源？如何帮助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还要把能源范围扩大，探讨整个生产链条、生活链条及整个自然链条的影响。所以能源变革有很多种，国际上特别重视，特地派来了国际能源组的组长，这

其中智库的作用很关键。

第四个分论坛是“智库的作用”。智库作为一个分论坛是第一次。智库的关键是它的思想产品，智库不仅仅对领导者、决策者起到重要作用，对企业决策也起作用。智库出招不是一般的高招，有可能是绝招。智库起到了出招、解惑、指路的作用。我们把智库思想放在一起交锋，然后提出共识。

还有“企业的责任”和“市场的力量”。我们始终认为当今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是动力。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它的责任可以分为五个：第一，企业是发展的动力，扮演着一个积极的火车头的角色；第二，企业要担负着气候变化、能源变革、减排等责任；第三，企业有一种社会责任；第四，企业的公信力；第五个最关键的是企业的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思想创新、渠道创新等等。

本次峰会的规模和参会嘉宾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

魏建国：目前来自国外的学者有120多位，40多个国家。这些人都是各智库和机构的著名人士。比上一届规模更大了，平行主论坛就有两个，同时进行。

本次峰会的嘉宾都是当今在这个领域里的权威人士和著名学者，有的甚至是前政要，当然我们是以智库为主。

为何“全球智库峰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魏建国：我们的议题是经过学者还有专家反复研究考虑的，并不

是只从中国视野，中国角度出发，而站在全球的视野，站在未来的视野，站在全人类发展的视野考虑，所以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也得到各国的认可。你站的高度怎么样，就决定你的题目怎么样。

“全球智库的峰会”，它是一种首创，在全球当今治理模式中一种非常民主同时又非常科学平等自由的创新，也正是因为中国是发起国，参加的人才会更多。

一个论坛的好坏，最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它的“选题”对不对。我认为“全球智库峰会”到今年是第四届了，从第一届到现在选题都选的很好，都是从大的视野，都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

选好题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智库要“接地气”，我们很多论坛做的不好就是接地气不好，要让最有权威的人讲最权威的话，比如基辛格曾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他说想当初美国代替英国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和平的，我相信今后中国代替美国这个过程也是和平的，但是这是一个长时间。”和“中美合作不见得能解决全球一切事情，但是中美不合作全球一件事情解决不了。” 什么叫权威的人讲权威的话，就是针对一个话题做到三点，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破题，最后起到解惑指路的作用。

“全球智库峰会”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基本上就是选题选的好，并让权威人讲权威的话。国外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对“全球智库峰会”寄予越来越多的希望，而原来只是参与。虽然很多国外智库来报名参加，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法进行更大规模的

接待。国经中心努力打造一个新型的智库，运营也不拿国家一分钱。

举办活动的资金从何而来？

魏建国：我们有一个智库基金，准备达到5个亿，在5个亿基础上它的增值部分来作为我们的研究。作为我们国经中心来讲，不只是办几个论坛，衡量一个智库也是三个标准：首先就是独立性，要独立地思考，不是依附于谁，拿谁的钱替谁说话，拿政府的钱肯定要为政府说话，因此我们比较公正。

第二个要有影响力，影响力靠什么呢？靠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所谓“思想库”，库里面有很多产品，库是各种不同的库，有民间的库，有学院的库，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这种库，有像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种库，也有像我们这种社会智库或者民间智库，这种库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在关键时候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国外的影响力比国内还要大，跟媒体关系也很重要。

第三，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会议的组织。国经中心成立时间不长，财政独立，我们又集中一批退下来的老干部，到底能拿出什么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这种大型国际化会议做好，从头到尾认真对待，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国务院和部委的鼓励，我们也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重任和信任，一个巨大的鞭策。

在中国举办全球性会议，一般先是立足中国，之后放眼世界，但是“全球智库峰会”先是放眼世界然后再立足于中国。

魏建国：这要深度的理解——首先是责任，我们有责任，从责任

再联系到我们的命运，从命运想到发展，再想到利益。应该说利益共同体打造成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打造成责任共同体，这是我们目标。

中国在全球是一个“大块头”，而且各国都很重视我们，非洲、拉美、南亚、中亚甚至欧洲都在看中国这个发展模式行吗？美国的全球发展模式跟中国提出全球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外国的领导人，都在注意着中国的发展模式，最终得出来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可行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共建、共享、共赢”，这个模式他们认为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威胁，而是让更多的国家搭中国发展的快车，搭中国发展的机遇。以一带一路为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整体的第三次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国家再一次以博大的胸怀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再来倒逼我们的一些机制。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逐渐地壮大，无论是一带一路、亚投行，还是全球智库峰会，中国都愿意推动，这一切也都是以公平为前提。包括美国国内的智库，穷国和富国的智库，俄罗斯和美国的智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智库，全球的智库因为种种原因很少有机会能够聚到一起。我们认为接触总比不接触好，对话总比对抗好，中国来做这件事比较公正，让大家都来说话。

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符合大家的想法。现在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国，在很多全球治理的事务上不发挥作用是不行的，中国也应该有责任。

中国一直注重包容性，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企业和当地企业可以参与，全球企业都可以，我们欢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企业，也不仅仅是国家资本，所有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

中国是包容的，开放的，互利的，共赢的，但是在一带一路投资要坚持五个选对：选对国家，选对项目，选对市场，选对伙伴，选对原则（互利共赢的原则）。历史将考验大国智慧。

（来源:2015 年 6 月 16 日,中国网）

第四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媒体联合采访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萨金特

时间：2015 年 6 月 26 日 10:00-10:45

内容:联合采访托马斯•萨金特问答

托马斯•萨金特，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光明日报：您长期在胡佛研究所工作，请问您如何看待智库成果在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如何看待智库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您对中国智库有什么了解吗？有没有什么建议？

萨金特：我在胡佛研究院工作了快三十年了。在美国，像胡佛研究所这种智库，一般都是比较自立的，跟政府是分开的，但研究课题一般都跟政策相关。研究员一般都是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的教授

和本身是学者的前政要，比如赖斯女士。这些研究员不仅对美国的运行模式感兴趣，也对其他国家的运行模式感兴趣，他们会去学习其他国家的历史，然后可以更好的理解。他们也会对政策提出意见和见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影响。当人在一个国家住久了，就会产生国家就是世界这样的想法。这时就需要像胡佛这种智库来研究其他国家。在胡佛，有只研究中国的专家，有东非的专家，三十年以前还有苏联的专家。这些专家会学习各国的文化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时候，其他国家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比美国要好，而我们就会想他们学习，会跟其他国家的智库进行思想交流。

经济日报：第七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美国华盛顿展开，您认为中美应该在哪些区域增强我们的合作关系？

萨金特：首先要说的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提建议。在我看来，中美合作和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从中美的贸易和交换有两种，第一种是经济上的，第二种是思想上的。贸易对两国是都有好处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交换的还有思想，人们交流思想的同时，就会的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更了解。作为一个教授，通常我都会有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学生。他们在中国上的大学，然后来美国读研，大部分真的十分优秀，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也对其他的学生，包括作为教授的我，都有好处。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不止一次从中国的数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

益。所以我认为，中美应该继续鼓励贸易和思想交流，让更过的学生来美国交换。

经济日报：您对现在中国经济有什么看法？

萨金特：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美国从建国以来就从没达到过中国过去二十到二十五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看美国，说美国增长的太慢了，希望中国在未来不会增长的这么慢。我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早晚也会变得像美国一样慢。当一个贫穷的国家慢慢转变为一个富有的国家，它的增长速度也会慢下来，不可能永远都在快速的增长，但这是正常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表示，已经派出团队前往北京开展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技术评估。同时，中国央行最近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 年)》明确提出，推动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您认为今年中国能否成功加入 SDR？中国加入 SDR 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怎样的意义，又会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萨金特：我个人认为，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一个小细节。一百年前，英镑是世界货币，而现在是美元，而这不是因为某些国际组织同意了。这是因为当年英国对待人民的方法，英国管理货币的方法和美国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失去了很多资源，而美国没有英国一样从开始就参与到战争之中，而且美国也因为战争发展的更快了。

战后，是各国商人们自己决定的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现今，中国的货币很强大，也有更多的商人选择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使得国际组织必须要认同中国在更加的国际化。我认为，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但也依赖于人民的想法，政府没有选择的权利，有这种权力的是人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加入 SDR 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怎样的意义，又会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萨金特：我认为会有一个好的影响，它带来的竞争力会使其他的货币更好管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如何评价“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将会对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推行这一战略过程中，有哪些难点需突破？

萨金特：中美有很多共同点，两国都是很大很多元化的国家。在美国，曾经有一次内战。内战主要是在东部，而位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是一个新成立的州。林肯总统因为害怕加州脱离美国，就在一个因为打仗缺乏资金的时期，建了一个越洲铁路，把加州和美国其他地区连在了一块。这个铁路的作用就是来创造一个国家，方便把人以及货物送到美国各地，也使得人们更加的团结。“一带一路”战略让我想起了美国的越洲铁路，它能带来很多的机会，也能让欧亚人民团结起来。

中国日报：政府新发布的改革计划包括了中国金融开放和鼓励

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中国的发展，在此之前，中国的发展一直都很慢，您认为这些改革能不能平稳的加快发展的速度？中国能怎样改进这项改革计划，才能没有经济骚乱？

萨金特：中国的超快速发展实在是一个经济奇迹。你说慢是因为你还太年轻，经济历史学家们会花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是怎么达到如此快速的成长速度。三中全会报告公布了中国的改革计划，我认为撰写这些计划的经济学家们很有学问，他们明白怎么才能资本市场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很难快速完成的，因为自由化就会加强竞争，必须在不完全打破平衡的情况下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进行的非常慢。现在也有想法说要减少国营企业占有的市场比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政府说想要改变国营企业的经营方式，所以会慢慢的招一些私人股东。在董事会里他们也会被代表，这样就能完全改变公司的经营目的。资本市场是越不受管辖，就越会有颠簸，长远来说一般自由化的市场会更有前途，但也一定会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这是无法阻止的。市场是会出错误的，它给人们一个机会把他们的新想法应用上，但这些想法不一定都是好的。市场提供一个让投资者们尝试新的主意的平台，也会根据主意的好坏来赏罚这些人。美国有很多所谓的新创公司，但百分之八九十都没有前途，但发展起来的百分之一二十就已经足够支撑和推动美国经济了。

中央电视台：相比于发达国家的陆续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则陷入了另一种危机。特别是许多曾经被看好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等，都逐渐失去了光环。你是否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重新回归发达国家？对于那些处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褪色的金砖国家，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

萨金特：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完善。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道路和学校，中国建的都非常好，而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本事建好。基础设施不完善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如果他们想发展更快，就必须要向中国一样建高速，建工路，建机场等基础设施。欧洲美国也有论文和报道关于其他国家，比如希腊，想要效仿中国，完善基础设施。

中央电视台：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显眼的国家，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拥有独特的优势，您如何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萨金特：中国对教育的看重和教育的高质量就是中国的长处。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各种资源中，人力资源最为重要。另外，中国在未来一定能带领世界作出新的产品，完成创新。

中央电视台：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否会出现经济危机？

萨金特：中国不会在近期遇到经济危机。我给你们画一个图，这是中国和美国 1800 年到 2015 年。现在我要画的是中美的年成长率。美国自 1800 年以来，都在以百分之二的增率成长。中美在 1800 年经济是相差不多的，但从 1800 年到 1980 年，中国经济基本没有

什么变化，但1980年后就已十分快的速度追赶着美国。韩国在上世纪也干了同样的事，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也慢了下来，跟美国现在的速度一样。我认为，在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你说年增长率百分之六不好，美国这么多年就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二。约翰• 泰勒说，如果美国做对事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但我觉得没有可能。而中国在未来增长线也会跟美国合并，中国现在还在已十分快的速度发展，不会出现危机。三中全会报告里就有说，我们不可能一直以百分之六到八的速度增长。人们必须明白，政府无法控制增长率，有影响力的还是人民，市场就是由世界的人民组成的。在报告中，中国政府说了会提供一个可增长的平台，但他们没有办法去实现经济的增长。

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您认为会在哪？

萨金特：增长点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以前一样还是一个受教育的，积极创业的人口。中国经济刚开始增长的初期，中国正在创新寻找更好的办事方式和研究新的，更好的先进技术。现在也是不断创新，不断在寻找如何有效的利用中国的资源，正是这些给中国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大国竞争的能力。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也开始跟中国竞争了。未来，中国的增长点还会是教育，还有中国人的努力和创新力。现今社会，创新的速度太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加速。

中央电视台：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正在经济领域开展许多改革。

你了解目前中国在进行的这些改革吗？你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建议？

萨金特：我认为，你们该问的中国经济专家不是我，而是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这些人不只是那些无时无刻都在学习讨论的学者们，也包括在工厂里干苦力的人们，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如何能使工作更简单，这就是经济建议。就包括那些建议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专家们，他们不是外国人，而就是中国自己的专家。我的建议就是继续听从中国自己的专家，然后继续讨论问题。

国家新闻办公室：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投行，您有什么看法？

萨金特：刚才我已经讨论过“一带一路”战略了，那我们就说说亚投行吧。我认为亚投行十分不错，它会带来更多的竞争，而有竞争就是一件好事儿。现有的国际机构很古老，也很倾向于二战之后经济和政治都很强大的强国，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关于怎么管理经济和发展的见解和坚持，很多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可以用到一些新的理念和做法，也需要新的机构来代表小一点的国家，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如果你是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你一定会对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感到赞叹。我不仅是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比，也是在跟其他强国对比，譬如说美国。中国拥有建造发达基础设施的能力，也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就因为这两点，我认为中国最适合发起一个基础设施的投资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有关经济合作，中美有过多次对谈，您认为会发生什么？

萨金特：我可以告诉你我希望发生什么。有些美国人不喜欢贸易自由，因为国际上的竞争会影响本土的垄断。受影响的人的权益在两大政党中都会被代表，他们希望关闭美国的大门。我认为这些人对美国没有好处，对世界也没有好处，但是这些人必会存在。美国也有很多人赞同贸易自由，最受益于贸易的人往往是一个国家里最穷的人。像我去的商店，百分之九十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制造的。贸易使得物价便宜了很多，从中受益最多的就是没钱的人，但这些人往往不被代表，也不明白贸易自由对他们的好处。

第四全球智库峰会期间媒体联合采访国际能源署前署长阿德南• 阿明

联合采访阿德南• 阿明问答内容

时间：2015 年 6 月 26 日 11:00-11:45

中央电视台：在这次峰会上，您发言的主题是什么？

阿明：这次峰会聚集了很多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想法的各方面专家。现在，世界正处于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型期。在世界的各地，经济增长，贸易趋势和能源格局都

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会主要讨论能源格局的变化，以及发展能源未来会面临的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能源需求会快速增长，在2030年，中国的需求会增长百分之六十，在部分非洲地区，会增长两倍，在部分亚洲地区，会增长一倍，如何来安全的发展才能达到需求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想讨论关于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以及在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里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能源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基石，而我们能否转型到一个拥有更清洁安全的能源的时期，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业率，地球变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日报：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你对这个目标有什么看法，它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阿明：这个目标对于未来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与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有着重大的关联。所以再生能源的进化对中国的能源格局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在2013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欧洲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总和，这对中国来说，从清洁能源供给的角度，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十分重要。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世界各地雇佣了超过九千二百人，而在中国就雇佣了三千四百人，占比非常高。通过中国的投资和创新，也大幅的拉低了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因为以上这些点，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为了更准确的分析，我们能源署发起了一项研究，与中外的专家一起，深刻的探讨和研究中国可

再生能源未来的潜力以及比重。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专家们不断的咨询，调查，看了各种不同的报告，从而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中国不仅能达到百分之二十，2030 年最高可达到百分之二十六。很多人说这不太现实，也不可能达到那么高，但我认为可以。我们每年都在低估中国能源发展的潜力，而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现实的预测，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知识和独创性使我们我们十分确定中国有足够的能力达到百分二十六。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会减少需求和消费，也会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中国日报：您对中国中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有什么样的预期和看法？

阿明：关于 INDC，解振华先生前几天在华盛顿说了一个很大的数目：四百一十亿，等同于六十五亿美元。这么多资金一定会完全改变中国整个能源行业，会推动创新，研究与开发，从而拉低技术的成本。这代表着中国将引领世界走向一个只有清洁能源的未来。因为中国的能源出口潜力，中国与全球能源经济处于一种大部分一体化的形态。

光明日报：新能源问题上，智库能如何影响政府，企业和社会，能起到什么作用？

阿明：我认为任何明智的政府决策者，如果想做出好的决定，必须跟很多人来请教咨询。事情一般都有很多因素的，而一个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因素。智库就是要起到这个作用，把很多想法不同

领域也不同的专家聚集到一起，这样才能对全球变化的问题上提出最全面的意见，对全球变化的主要因素有更深的见解，研究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将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帮决策者做出最明达的决定。正因如此，把各大智库的领导者们聚集在一起深刻讨论才至关重要。这对中国来说也很关键，因为中国在渐渐转型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所以中国做出的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光明日报：在持续发展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上，中国能做什么？

阿明：我认为中国能做的还有很多，尽管中国已经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之一。中国的总装机容量现在是世界之最，中国也是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力，水力发电技术发展的领航者。在国际能源决策中，清洁能源的未来发展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就会很关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从中国加入了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国际转型到一个拥有更清洁安全的能源的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国需不需要再做更多？

Amin: 我们已经跟中方有了很多的合作，自从中国加入以来，我们多次讨论关于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新能源技术和策略方面的完善。因为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全球领导人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能与中国一起举办一次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探讨将会来临的能源革命。在地区计划上，我么也与中方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中国

的专家与我们一起计划发展非洲及岛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当地政府提供培训计划。中国积极的参与到了国际能源讨论，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百分之六十七左右，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打算怎么帮助中国减少煤炭消费。

阿明：煤炭消费尽管还是很多，但也在慢慢减少。几年前，它的占比是百分之八十五，现在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七，而长期来讲，消费还会继续下降。现在技术的成本正在减少，在过去的五年里，太阳能技术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风能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与此同时，现在也有计划说要发展能源行业的基础设施，比如说超高压电线以及能接纳优化多种能源的智能电网等等。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了这些技术，是个十分好的走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继续加快，而技术发展的增长速度持续减慢，如何提供便宜的能源就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以后可再生能源会与煤炭形成竞争。政府需要解决连三个问题。第一是应该如何投资，研究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第二，也需要研究能烧煤少污染的技术，在未来如果还是要烧煤，那也必须增加烧煤输出的能源，这样既减少了污染，也增加了效率。第三，需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率的分配电能，减少能量流失。这三种技术现在都在逐渐更新，其中原由就是因为中国对污染问题以及减排问题的重视。现在，北京已不再是世界上污染最厉害的城市，政府也向清洁能源

的发展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我认为在未来，跟煤炭比起来，可再生能源拥有相对优势。

腾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会怎样向成员国提供发展以及宣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帮助？

阿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组织，在四年前，是由六十几个国家共同开创的，现在已与一百七十个国家有交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受到这么多的重视，我认为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可再生能源看做未来解决能源问题的答案。关于可再生能源，现在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知识结构，信息和数据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署现在就希望能建立一个关于可再生能源最好的数据库。我们现在有关于技术成本最可靠的数据，以这为出发点，希望能提高技术的质量，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标准，也能让投资者们对技术有更多信心。 我们也在与很多国家一同合作制定国家级的监管政策框架。我们在与很多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一同合作创造一个新的投资环境。我们也在研究开发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配电系统。研究围绕着电网的升级，智能电网的开发，接纳多种能源的配电系统，受影响的技术，以及对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影响等问题。只有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知识结构和知识产品，从而提高效率。我们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用我们的知识产品创作一个可行的投资结构。我们拥有可再生能源方面最好的知识产品，会帮各个国家对症下药，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在做一些地区性的计划，我们想

在非洲建立一个绿色能源丝绸之路，促进能源与技术的贸易。我么也在与一些岛屿国家合作，这些国家常年因为能源问题，以及技术不发达而受苦，他们必须依靠进口的石油提供电力，但问题就在石油提供很贵，来源又不可靠，而且污染还很严重。我们希望能根据他们自有的资源，帮助他们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这样，他们就不用依靠进口，而且使用的能源也更环保便宜，真正的实现了能源安全及自由。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组织，我们不去考虑怎样解决过去的问题，而把精力更多的放在与很多国家合作寻找未来的机会。

中国日报：您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什么看法？

阿明：经济转型总共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中国近十五年的快速发展，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以及政府的改革政策不仅让中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也帮助了很多人民走出贫穷困境，变成了对社会对中国经济有利的人。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也带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不仅成为了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但早期的增长也带来了很多的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污染。我想，第二阶段的成长就会主要专注于增长的质量，而不再是增长的数量。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质量，如何让发展更绿色更清洁，怎么提高效率以及如何减少污染等等。第二阶段十分关键，应为很多国家将来需要向中国学习。绿色经济不仅关于环境问题，更主要的是以系统方法来确保发展是可持续的，不超出自然的限制，为人

民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促进能把人民带出贫穷困境的长期的良性增长。所以我认为第二阶段是有质量的发展，从这方向考虑，能源就是经济的基石。如果能使基石更稳固，如果能然环境更干净，达到能源安全，注重可持续发展，那接下来的发展就一定会是很有质量的.

中国日报：您对“一带一路”计划有什么看法，将会对中国和世界来什么影响？

阿明：三四百年以前，丝绸之路对发展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才能以中国为中心，促进了很多经济与人文的交流。新的丝绸之路起到的作用也使促进经济合作及文化交流，从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个计划也非常重要。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我们也有计划在非洲发展能源丝绸之路，我们要连接世界各地的经济和能源系统，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大的有弹性的能源系统，也会创造一个更大的能源市场，促进更多的投资，减低成本，但最重要的是促进国际合作，使各国更加理解对方，最后迎来的就是真正的和平。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正在大力推广核电的发展，您认为核电的前景是什么样的，跟可再生能源比有什么优势？

阿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能源系统，会根据自国的需求及资源，决定怎么发展。在中国推进能源改革的是碳减排和减轻污染，这些问题是燃眉之急，而眼前最合适的解决方法，从中国的角度来

看，就是发展核电。但是，从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是更有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在未来会更便宜，更安全。核电不仅需要花钱处理放射性废料，还需要花很多钱训练工作人员，以免发生核外泄，不安因素也比可再生能源要高。我想未来还是需要考虑各种能源的相对优势，然后才能决定未来能源系统的走势,来决定怎样投资。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2.66 万辆，虽然同比增长近 3 倍，但与同期 600 万辆的汽车产销相比，占比不到 0.5%。这背后的原因包括消费观念滞后、配套系统如充电桩等设备不完善，动力电池供应严重不足等方面，您认为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如何，怎样才能突破现有的困境？

阿明：运输系统用的化石能源就是导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现在中国需要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发展运输。一种答案就是电动汽车，而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投资研究开发这项技术，中国现在就是汽车储蓄电池创新的领航者。有竞争，就会把价格拉低，那电动汽车就会更加普遍。问题就是如何来产生汽车用的电。如果电的来源有污染，那这项技术根本就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只有用洁净能源发的电来充电动汽车，才能做到真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另外一种答案就是生物燃料。但现今很多国家食物都不够，所以国际上一直都有争论，很多国家也很不愿意用可食用的植物开发生物燃料。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生物燃料也不是没有前景，现在还处于研究初期，但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如何使用农作物残余来生产

生物燃料。

光明日报：“一带一路”计划将对中国商业有什么影响，产生什么机会？

阿明：当然会有很多机会，我听说还会有很多投资，包括四百亿美元投资在各种项目上，也有四千一百亿人民币计划投在 INDC 里。如果“一带一路”计划真的能实现，那经济，贸易，传输通道就会变得互相连接，也需要比现在多很多的投资。这种用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如果只有经济活动，没有基础设施，那增长就不会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就是为了铺垫未来的经济增长，发展基础设施。经济成长的机会是很大的 ，而中国已经是开发创新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领导者，比如说新的传送系统，以及电压更高的高压电线，这些对长距离传输电能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在未来，投资的前景也是十分好的。

[媒体报道]

李克强会见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并座谈

本报北京6月26日电（记者李伟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主要代表并座谈。

来自世界各国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负责人、前政要、国际组织和工商企业界代表50余人出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前美国总统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顾问波德斯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等代表围绕本届峰会“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主题，就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中国经济等议题发表看法。李克强同他们进行交流并一一回答了提问。

李克强表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出台15年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减贫目标，在教育、就业、性别平等、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展，总体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主题，携手制定公平、包容、可持续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

李克强指出，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工业化，积累了

充裕的产能、较强的装备制造能力和比较丰富的发展经验，愿同各国加强分享与合作，共促可持续发展。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开展双边和三方产能合作是一个重要路径，有助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和增长。

李克强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今年5月以来，工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就业稳中有升，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我们将继续实施区间调控，加强定向调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基本公共服务。我们有能力、有条件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希望国际智库多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为增进中国同世界的了解与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与会代表表示，改善全球治理，推动发展减贫，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国发展减贫取得巨大成就，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做出重要贡献。愿通过全球智库峰会平台，加强对华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出席。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27日 01版）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　刘延东出席并致辞

人民日报北京6月26日电（记者王观、王珂）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26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为主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刘延东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愿景的重要共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坚定支持和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促进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积极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刘延东说，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凝聚全球的智慧和力量。国际社会应牢牢把握合作共赢基本主线，把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核心，推进经济、社会、环境平衡发展。加大教育发展力度，加强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创新合作，推动创新成果传播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多样文明和谐共生。坚定和平发展理念，认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治理体系。她希望各国智库发挥思想梦工厂和战略储备库的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多献务实之策，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全球智库峰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出席。

（《 人民日报 》（ 2015 年 06 月 27 日 04 版）

凝聚全球智慧和力量 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

编者按：6 月 26 日—27 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新路径”为主题，来自全球近 30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600 多名代表出席，并围绕绿色发展、全球治理、智库作用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探讨，为世界各地的思想家、战略家搭建了一个开放交流、融通思想、凝聚共识的平台。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发布了《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将对全球深化智库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世界探寻可持续的新路径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综述

2015 年 6 月 28 日 5 版《 人民日报 》，记者王 珂 王 观。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的核心内容

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表示，2000 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所确立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在世纪之交的一大创举。15 年来，国际社会付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情况很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进展还存在较大差距。

曾培炎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今后15年的目标必将迈上新台阶，内涵也应不断拓展和充实。中国真诚希望联合国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让更多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推动世界更加持续、健康、绿色、稳定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本届峰会发来书面致辞。他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全球智库峰会，汇集各国智库专家智慧，联合国对此高度赞赏。联合国将制定行动计划，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和预防侵犯人权的行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望未来依然任重道远，联合国期待与各国智库通力协作，推动和平、发展和人权三大领域不断取得进步。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表示，中国的扶贫工作积极而富有成效，世界在扶贫领域取得巨大进展，离不开中国的努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成为今后世界发展的关键。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及未来全球发展的核心内容。应充分利用今年9月召开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会议和12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契机，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发展议程应聚焦减贫和消除赤贫，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性。在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上，充分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提供创新思维。

推动绿色增长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本届峰会举办了两个平行综合论坛，分别讨论了“气候变化”“绿色增长”“消除贫困”“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与会者认为，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是各国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阿德南·阿明认为，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定要了解技术基础和应用，还有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增长以及碳减排的贡献。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这一点，将有利于全球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发展，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去年 11 月，中国宣布了 2030 年行动目标，在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与会嘉宾认为，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是关系人类未来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增长需要各国共同合作。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各项工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包容发展、绿色发展新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国共同致力于推动科技进步，秉持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理念，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广泛开展科技合作；需要各国共同致力于解决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致力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体系。

努力搭建开放交流的大平台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21 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和力度会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决策。各国单打独斗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国家之间密切合作才可以产生更大影响。无论是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还是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推动建立智库之间的联合政策委员会，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的智库合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说，智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排除错误的数据，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以美国为例，智库可以提供一些如 GDP、债务等方面真实的数据。

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于 2009 年举办，之后每两年举办一届，创造了世界智库交流交往的新平台。历届峰会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提出针对性强、富有远见的讨论主题。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 年后中国和 G20 面临的机遇》《从中国到全球：寻找可持续发展新航标——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研究成果，形成并发布了《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致力于研究全

球经济和战略问题，开展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提供咨询服务，愿意与世界各国同行一道，借助“全球智库峰会”平台，交流思想，启发智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新贡献。

智为国所用 策为民而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书写中国智库动人故事

2015 年 6 月 22 日 1 版《光明日报》，记者王斯敏 曲一琳。

随着 6 月 26 日临近，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进入开幕倒计时。两年一度的各国智库“大团聚”,吸引了数十个国家的近百位智库专家、各界领袖相聚北京，共话发展。

“组织这种规模和层次的智库峰会，只有中国做得到。”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 2009 年参加首届峰会时的感慨，声犹在耳。

六年倏忽而逝。作为峰会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已在为国谋良策的道路上跋涉六年，播撒一路精彩——资政研究成果丰硕，一批聚焦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与重大热点问题的研究建议转化为国家重大战略；公共外交效果显著，全球智库峰会、中美“二轨对话”等品牌活动增强了我国国际舆论主导权；

“中国经济年会”“经济每月谈”等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在中国迎来“智库时代”、探寻新型智库建设之路的明媚春光里，国经中心书写着中国智库的动人故事。

搭建世界级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2009 年 3 月，寒冬迟迟不愿退去。时值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中国也正面临宏观决策的严峻挑战。怀着“办民间智库、融智慧资源，为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的责任与热望，当月 20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宣告成立。

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筹办首届全球智库峰会。

“金融危机带来的是世界性问题，要促进问题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各国智库一起讨论，共商对策。”商务部原副部长、现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记忆犹新。

经过 3 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忙碌，7 月 2 日，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为主题的首届峰会亮相北京。

会场内外星光璀璨：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60 多家国外智库，基辛格、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前政要，蒙代尔、尤努斯等诺贝尔奖得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知名学者、跨国公司 CEO 等 800 多名中外人士汇聚一堂。三天里，专家们“会诊”金融危机根源，研讨危机解决方案，发布了“全球智库峰会北京倡议”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北京倡议”。

从形式到成果，峰会获得了普遍赞誉——全球共有6000多家智库，此前尚无一家办成此类峰会，一家新成立的中国智库却将其变为现实。普罗迪指出：“这个创意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基辛格接连参加了三届峰会，多次赞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做了别人不敢想也做不到的事”。

如今，全球智库峰会已成为国际智库界知名品牌。2011年，第二届峰会商讨“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2013年，第三届峰会畅言“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即将举办的第四届峰会聚焦“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的新路径”，向全世界发出“凝聚共识、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中国声音。

“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是国经中心创立的又一国际交流品牌。

中美关系，事关重大。但在现实中，两国经贸纷争不断。如何构建符合两国利益的、具有建设性的经贸合作制度？国经中心自2011年起，与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举办此项对话。对话每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举办一次，如今已举办六轮。由于其非官方性质，也被称为中美“二轨对话”。

“双方坦诚相见、畅所欲言，政府间不便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交流与博弈。”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先后参加了六轮对话工作，深感“争论常常相当激烈”。中美如何建立“互信、包容、公正、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贸易不平衡问题怎样化解？许

多问题被直言不讳地提出、讨论，一些对话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在第五轮“二轨对话”中，国经中心提出了将“中美投资协定”发展为“中美投资与贸易协定”的主张，并与著名的美国彼得森研究所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2014 年 9 月，该所发布报告称：如果中美签署投资与贸易协定，每年将增加 5000 亿美元的贸易额。今天，国经中心正在积极推动这一构想变为现实。

更多的国际平台逐步搭建：召开“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创造了气候变化等多边问题的“二轨”机制；受 G20 轮值国主席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委托，承办 G20 中国南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讨论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为新兴经济体争得更多话语权；与日本产学官交流机构、韩国贸易协会联合主办“中日韩自贸区民间高层研讨会”，呼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

在为世界智库搭建“舞台”的同时，国经中心自己也成了舞台的主角。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研究所、野村证券、法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再造委员会等著名智库纷纷和中心建立起密切联系，为中国声音传向世界开辟了通途。

提出“中国方案”，助推国家发展

6 月 29 日，启动筹建近 8 个月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举行章程签约仪式，57 个创始成员国共商该行规章制度、运行规范等诸

多细节。若一切顺利，亚投行有望于年底前开始运营。

国经中心关于亚投行运营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已基本成形。很少被提及的是，亚投行的问世凝结着这个团队的智慧与心血。

2013 年初，基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融资需求，国经中心经过深入研究，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机构”的战略建议。半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发出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举措的正确性。这个全球国际性金融机构中的“后来者”，迅速成为吸引合作、凝聚力量的“强磁场”。

生产思想产品是智库的立身根本；国家发展需求是智库的选题准绳。在国经中心会议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八个大字：“创新、求实、睿智、兼容”，这是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对整个团队的期望与嘱托。在这样的内驱力作用下，中心出产了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并不断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显出成效——

几乎每次党的重要会议召开之前，都有国经中心提供的智力参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提供建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50 条）》和构建国家安全体制的方案，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提供参考；《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几点建议》，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提供咨询；

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都有国经中心打造的重磅成果：经

济、外交、法治、能源、金融、创新驱动……六年来，中心通过自身设立的交流基金项目支持了150多个重大课题研究，并通过《要情》《研究报告》等内部刊物向决策层呈送成果1600余件。

为配合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国经中心还每年编制发布“转变发展方式指数”，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合作开展“中国可持续性绩效指标体系研究”，对完善中国可持续性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实际作用。

一方面思考国家战略，胸怀全局；一方面心系区域发展，服务地方。六年来，中心与全国10多个省区及各类企业开展合作，高质量地完成一批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研究》《湖南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等建议已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秦皇岛大北戴河区发展战略、国家种子“硅谷”发展战略等正在积极推进落实。

“努力做到先见、先知、先谋，敢出大主意、早出好主意，国经中心历来如此，从未放松。”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现任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如是总结。

解析“中国路径”，启迪民众智慧

6月15日，北京，光明网视频演播室。国经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镜头前深剖浅析、前瞻回望，将“如何把握新常态下的新亮点、新机遇”的话题讲述得晓畅而深刻。这是“新常态·光明论”系列大型访谈节目的开篇之作。以此为开端，

国经中心专家们将通过光明网陆续走进大众视野，为网友们揭开经济“新常态”的神秘面纱。

启迪民智、增进共识，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又一神圣使命，也是国经中心须臾不忘的自我要求。

4月10日，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不到两周后，国经中心率先举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张晓强代表中心作了对“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智库解读，并邀请国内外各界人士交流讨论。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会上郑重纠偏：“有报道说‘一带一路’只圈定了18个重点省，没被点名的就没有纳入。实际上，‘一带一路’关乎全国，不存在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紧接着，多位嘉宾将“一带一路”构想讲得通透明晰。台下自发赶来的听众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智囊”的睿智与力量。

除了应形势需要不定期举办的各类活动，国经中心还拥有影响社会公众的两大常规品牌——一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年会和每月举行的“经济每月谈”：

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展望；解读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直面挑战、创新发展、实现“稳中求进”；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把每届中国经济年会的主题串联起来，就是一幅宏阔而清晰的“中国经济走势图”；

高度聚焦的热点话题，相应领域的权威专家，极具针对性的主题发言，听众参与的深度讨论……“经济每月谈”至今已举办了70余期，话题先后涉及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诸多热点，聚焦老百姓关注的难点问题，宛若一位陪伴在百姓身边的智者，随时回应疑问、指明道路。

为了更好地宣传解读国家大政方针，国经中心还每年组织撰写《国情报告》《世情报告》，并创办《全球化》杂志、编写出版“智库丛书”，为社会公众提供参考。“既能‘顶天’，也要‘立地’”，这一宗旨在中心的成长中彰显无余。

新的起飞：构建体制机制，树育家国情怀

国经中心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规范严密的体制机制，离不开高效而团结的人才队伍，更离不开深蕴于每位成员内心的家国情怀。

在老一辈领军人才的带动下，中心人才成长迅速，从组建之初的18人逐步扩展至7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高层次研究人员为主的骨干队伍。

虽然著名专家、资深学者云集于斯，严谨认真的作风却丝毫不减。在这里，国家召唤是必须服从的进军号，求真务实是不容挑战的“军规铁律”。

一项项重大成果背后，留下了领军者身先士卒的身影和殚精竭虑的付出。

为保证研究质量，中心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魏礼群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把谋划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重大选题当成了最重要的“必修课”；中心上一届执行副理事长、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王春正任咨询委员会主任，组织了许多重大咨询课题，花几年时间完成的“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重大战略。

年轻人将这一切装在心里，杜绝浮躁，勉力前行。

每写一篇研究报告，副研究员景春梅都斟酌再三，反复自问。“够不够公正客观，会对国计民生产生什么影响？”从博士毕业一心想着“多发文章”到今天的慎重严谨，她从前辈们身上学到了责任与使命。

副研究员王天龙的著作出版了，他坚持在封面印上“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学习与思考”的副标题。这是一种由衷的致敬与感激。回想起五年前对着第一篇对策建议文章无从下笔，反复修改“几乎改哭了”的情景，这位研究骨干感念不已：“是前辈们对问题的洞见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从政府部门到大学讲坛，再到国经中心，徐占忱的人生价值感日渐丰实，身边却总有朋友“好言相劝”——论收入，他的所得绝

不丰厚。然而，他却醉心于今天的事业：“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我们的这件大事，绝不是金钱。”

“现在中心上下人心很齐：要把国经中心建设成高质量、高水平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此，我们会进一步改革创新，探索‘小机构+大平台’的发展运行模式，更牢固地树立品牌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全面提高中心研究能力和交流水平。”国经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张大卫话语凝重。

不负过往，更待来年。国经中心已经开始酝酿新的出发。他们深信：积跬步方能致千里，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之路上，要做步履坚定、永远前行的探索者。

减贫与增长的全球治理之道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综合论坛精华撷集

6月27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再推思想盛宴。

上午八点，题为“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两场综合论坛同时进行。

“通过全球智库峰会平台，立足人类共同利益，谋求全球可持

续发展。”怀揣共同心声，57 位中外专家逐次发言、回答提问，聚焦减贫、增长、全球治理三大迫切难题，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深层解析与具体建议。

减贫：成就与挑战同存

“过去 20 年里，我们的减贫工作步伐加快，取得很大进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发展政策司高级社会事务官员阿姆森·西班达说，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有的地方贫困人口反倒增加。因此 2015 年将有一个新的路线图，争取在 20~30 年的时间里，消除绝对贫困。他强调：“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要真正以人为中心。”

“必须把解决穷人的问题作为重要任务。”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中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全部脱贫。”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说，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人瞩目。他认为：“数以亿计的人走出了贫困，因为中国政府几十年前就已制定出有效政策，并坚持执行。这不是奇迹，是不懈努力的结果。”

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印度也在不断探索减贫的有效路径。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席谢刚指出：“中国摆脱贫困的进程很快，归功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减贫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增长。”

增长：绿色与持续并重

“增长和绿色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苏玛·沙克拉巴蒂列出一组数据，阐释“绿色化”为什么能够促进增长，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增长。他建议：“为绿色增长提供切实支持与实用技能，从一个能效低下、过度依赖石化能源的世界变成一个可持续、环保的世界。”

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认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联合国应当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一些论坛和机制，关注能源、粮食、传染病等问题，帮助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绿色增长。”

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特雷莎·里贝拉呼吁：“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要真正推动绿色增长，必须建立通力合作的大局观。”

“在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时候，亚投行将会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绿色、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表示，将避免走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只注重发展、不重视绿色、先污染后治理的一些老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帮助成员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全球治理：传统与新兴合力

“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感言，“要秉持包容、透明、开放的原则，建立国际机构和相应机制，实现共同利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直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滞后，不利于新兴经济体转型升级。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对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优化，更要充分发挥新的治理机制作用。“G20 峰会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变革的新趋势，当前需要务实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实 G20 的治理机制，如设立秘书处和 G20 倡议实施委员会，探索建立 G20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协调机制等。”

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里·雷旭·乌苏尔说：“我们必须使旧的国际机构实现现代化，如联合国，改变北约、欧盟等一些现有的组织，还要重视一些新出现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非盟，他们也已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

“要实现更好的全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主任康斯坦丁·诺斯克夫认为，新的机构如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都要发挥作用。“他们需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项目，需要设定新的目标，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应该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光明日报记者 曲一琳）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立足中国 研究中国 为了中国

——中外智库专家建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27 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京落幕。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的各界专家汇聚，在为2015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路径“开方抓药”的同时，也普遍关注中国智库建设。

27日下午，峰会开辟“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专题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邀集近20位中外代表展开讨论。议题高度集中——中国智库建设机遇与挑战；观点深刻丰富——对中国智库发展路径的剖析与建言。

根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智库建设道路

中国智库建设要不要学习美国？在论坛上，中外智库专家表现出一致态度。

“中国非常善于学习，但是必须创造适合中国发展方式的智库文化，找到自己的智库建设模式。”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智库拥有巨大潜力和希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他数次来华，看到北京“不论政界、学界还是企业界，都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思维，讨论话题也很广阔”。

“如果我要创建一个新的智库，我会选择中国。中国智库有良好的前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坎普表示。他从大西洋理事会的实践经验出发，支持中国“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建设智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明确表示：“我不建议把美国的模式转移到其他国家，我只想让大家对国际顶尖智库的发展战略和组织架构更加了解。”

怎样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智库专家十分清醒。“中国智库有自己生长的土壤，只能在中国环境里设计智库的未来可能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等人表达了智库建设“立足中国、研究中国、为了中国”的坚定态度。

“中国智库建设肯定要走中国道路，但同时也是开放性的，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衷心希望能向世界优秀智库学习，有辨别地吸取经验，从而找准中国智库建设之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主持论坛，总结了此次研讨的主旨与期待。

破除痼疾：切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看来，中国智库建设有其必须坚守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发展是不可改变的铁律，也有其必须改变的方面，首先，就是用改革创新的方式解除体制机制束缚。“我们要看到，决定智库未来的关键是制度，而不是热情。中国人都有‘士’的情怀，但没有制度保障，热情很难变为现实。”他呼吁，当前亟须建立两项制度——人事制度、筹款制度。“智库提供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要有较为完善的筹款制度支撑其发展。”

黄仁伟也十分关注智库用人制度的改革。他深切感受到智库人才存在学术与决策脱节、理论无法结合实际的痼疾。如何改变？他认为，可以采取政府与智库互派人才、交流锻炼的方式，“形成制度，

让官员在任特定职务前进入该领域智库做一段研究工作，帮助未来官员形成战略头脑，也明白如何尊重和使用智库；智库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一段时间，可以更好地掌握决策需求、明确研究方向”。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谢刚从印度智库发展的经验出发，给出建议：必须加强智库研究的激励机制，保护并强化智库成员提供政策咨询的积极性；要对智库进行专业的审计和核查，建立起一套评价智库的专业评估标准。

“中国需要多种类型的智库。所以，应该采取针对性政策，建立起适合不同类型智库发展的、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同时，要进一步创造法律、金融等方面的空间，促进智库群体发展。”詹姆斯·麦甘表示。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畅通智库成果转化渠道、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更多关于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建议，在中外专家的坦诚交流中逐一呈现。

核心标准：产出切实可用的高质量成果

智库不能有“库”而无“智”，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始终强调的观点。什么是智库之“智”的集中体现？首先就是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如果没有拿得出手、起到作用的成果，建立再多的‘库’也没用”。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对此深有同感：“现在智库文章特别多，但有的毫无新意、粗制滥造，提不出有可

操作性的具体建议。”她认为，作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疑难杂症”的机构，智库要出高精尖产品，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智库研究不仅要有理论高度，而且更要有现实针对性。进一步地，成熟的智库必须有长期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如果只是应付现实问题，而没有长远的研究储备，研究成果很难有高度和深度，也必然缺少发展后劲。

“重要的是，智库应当成为一个提供行动方案的库，而不仅仅是一个‘空想的库’。一旦决策者需要智库提供建议，智库要能快速响应，提出解决方案。”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表示。

怎样产出高质量的资政研究成果？专家们认为，人才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是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用“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三个词概括智库人才的必要特征。他认为，智库学者应该对特定研究领域有专门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专业程度的核心技术；有走向市场竞争接受实践检验的能力。

“中国智库里的人才应该更加多样化，不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研究员，也应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整合起来，更能符合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马丁·雅克认为。

郑永年心目中的智库人才，必须有“知行合一”的能力与自我要求，有不依附于权贵利益的独立心态。在他看来，这甚至比呼吁

体制机制改革更为根本，“人如果不变，体制怎么变都没用，学者应该多一点自我反思，多一点身体力行，而非整天抱怨外因不成熟”。

开放心态：加强国内合作、国际交流

为了了解各国智库的真实生存状况，詹姆斯·麦甘每年都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外奔走。他急于和中国智库交流的是，如何打通学科界限，实现智库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从而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跨领域的，单一学科背景很难应对”。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看来，和“跨学科、跨领域”同样重要的，是智库之间的团结合作。“一定要认清智库发展的时与势。今天的中国智库还处在发展阶段，只有各家智库携起手来抱团发展，各自‘跨出大门’，才可能共同提升中国软实力。”

在国内协同发展，与国外加强沟通。谢刚建议，中国智库要跟全球进行常态化交流、多层面沟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我们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反映到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及时优化我们的决策。”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能够在中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提议和设想，比如‘一带一路’政策，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有些国家对此并不了解，甚至会有误解，这就需要智库更好地向外部传播。”马丁·雅克指出。怀着期待与热望，他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表达了期待：“希望中国智库健康发展起来，

不但引领中国改革，也在推进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强大的力量，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成果摘要]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3 期：经济增速下滑的应对之策

【摘要】尽管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但宏观经济在积极转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出口正在向高附加值升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兴起，金融市场改革稳步推进。下一步，应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稳定政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创新驱动，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内外兼顾，培育经济新增长极；金融支持，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4 期：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面临四大分化趋势——国际经济形势与应对政策之一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面临以下分化趋势，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明显分化，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化表现为“美扬、欧缓、日衰”，新兴经济体部分国家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改革挑战；二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特别是美联储面临收紧货币政策压力同时，欧元区和日本则继续扩大量化宽松（QE）的规模；三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金融市场面临分化趋势。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5 期：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分化新趋势的政策储备——国际经济形势与应对政策之二

【摘要】为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分化，我国应形成以下政策储备，一是短期内适度放宽财政货币政策，加快重大项目安排和进度；二是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消费过度外溢，逐步实现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三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四是创新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走出去”化解产能过剩；五是借鉴“高铁经验”，开创中国品牌和高端制造创新新局面；六是加大能源和大宗商品储备，掌握定价权；七是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6 期：提升农业节本补贴效能的建议

【摘要】我国农业进入成本与价格的“双高”时代，以“种粮直补”为主的节本补贴虽在总量保持逐年上涨，但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当前节本补贴政策在操作方式与实施效果上存在的问题，应适时调整补贴项目由“黄”转“绿”，强化农业补贴的动态性与合理性，探索将短期直接补贴与长期间接扶持相结合的节本补贴有效路径，提高农业节本补贴的政策效能。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7 期：充分发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华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我国海外华侨华人华商具有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政商人脉广泛等多方面优势，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优先战略方向应为东南亚国家，这个地区是华侨华人华商的传统聚集地区。要采取切实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华侨华人华商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8 期：创新推动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发展

【摘要】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是国家通侨联侨的重要枢纽，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需要加快改革管理体制、创新投资贸易机制、创新文化合作模式、创新侨务工作方式，充分聚集和发挥侨资侨智，在营商环境、文化合作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实现快速发展，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探索新路。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9 期：运用 PPP 模式 复兴中医药文明

【摘要】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中医药发展存在药材、中成药、人才、体制、法制“五大瓶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破解瓶颈制约、复兴中医药文明的有效途径。通过财税、金融、土地、人才、法制“五大制度”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加快试点示范，壮大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人类身心健康服务。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2 期 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第七十一期“经济每月谈”综述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71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演讲嘉宾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的重头戏和突破口。稳定宏观税负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税收改革的重点是减间接税、增直接税；预算改革的目标是全面规范、公开透明。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3 期 加快期刊评价体系改革促进我国智库刊物发展——智库期刊评价体系研讨会综述

【摘要】智库刊物是智库进行合作交流和广泛整合学术资源的重要平台。我国智库正处于大有作为、规范发展阶段，亟待充分发挥智库刊物的关键作用。我国智库期刊面临很多制约因素，直接影响我国智库期刊的办刊方向、生存发展以及我国新型智库的影响力竞争力，事关我国新型智库服务决策能力建设的大局。建议加快改革现行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设立市场信誉度高、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价认证机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期刊评价体系。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4 期 亚欧互联互通新机遇与产业合作未来——“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综述之一

【摘要】近日，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全体会议上，有关国家代表就亚欧互联互通新机遇与产业合作未来议题发表了见解。代表就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重大意义、合作领域及相关国家参与优势，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嘉宾指出，加强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势在必行，亚欧会议成员迫切需求加强亚欧互联互通；中欧之间应加强高科技领域、老龄化问题、环境领域合作，应在金

融、贸易、投资、物流、大国关系等多方面创新合作方式，并发挥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各方面作用。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5 期 推进互联互通中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创新——“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综述之二

【摘要】近日，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专题讨论中，有关国家代表就推进互联互通中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创新发表了见解。代表一致认为，亚欧互联互通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亚投行是亚欧互联互通的成功范例；做好互联互通中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关键是要实现有监管和金融自由化间的平衡；要注意发挥政府在互联互通中的公共服务作用。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6 期 以重点领域合作提升区域联通水平——“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综述之三

【摘要】近日，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专题讨论中，有关国家代表就以重点领域合作提升区域联通水平发表了见解。代表就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园区对接与合作、航空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探讨。嘉宾指出，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分享发展诉求，共谋战略规划，加强交

通项目落地合作；工业园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在亚欧工业园区合作建设中将发挥建设性作用；航空二级枢纽建设不足，直航城市不足，高端航空服务市场发展迅速。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7 期 打造各界共同参与亚欧合作的新格局——“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综述之四

【摘要】近日，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专题研讨中，有关国家代表就“打造各界共同参与亚欧合作的新格局”发表了见解。与会者认为，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既推动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也着力推进制度、规则等“软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应该发挥企业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中的主体作用，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夯实亚欧互联互通合作的基础；努力搭建智库和中介机构的合作平台，为亚欧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智慧，为亚欧互联互通发挥重要的桥梁和参谋作用。高度重视文化合作，推动亚欧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亚欧互联互通的前导链和压舱石，推动开展亚欧文化贸易。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8 期 让互联网+助推亚欧互联互通—“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综述之五

【摘要】近日，在“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专题研讨中，有关国家代表就推进“互联网+”发表了见解。与会代表认为，互联网+符合时代特征和发展需要，可将亚欧大陆有效连接起来，推进亚欧商贸往来、技术进步和人员交流；互联网+贸易+物流能扩大亚欧经贸规模，促进跨境电商和综合运输业快速发展；互联网+开启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新时代，提升创新创业的灵活度和成功率；互联网普及利用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和 5G 通信网络的广泛覆盖和便捷接入。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9 期 各国应为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而努力——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综述之一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主题研讨中，与会专家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见解。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巴黎气候大会仍面临许多困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密切合作，以促成巴黎协议。与会代表还认为，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是各国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手段；中国要加强立法和制度设计，循序渐进推动碳市场建设。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0 期 减贫应建立健全精准“滴灌”的政策体系——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综述之二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主题研讨中，与会专家就“减贫”问题发表了见解。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任务,贡献巨大,但要认识到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工作的艰巨性。专家建议：将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作为减贫的重要工作基础；建立健全精准“滴灌”政策；处理好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多元化、包容性的减贫政策体系。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1 期　共同促进全球绿色增长——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综述之三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主题研讨中，与会代表就“绿色增长”问题发表了见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在绿色增长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建设一个绿色的“一带一路”非常重要，亚投行秉持绿色环保理念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增长需要各国共同致力于科技进步，需要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治理体系，需要政府、企业、智库等机构的同心协力。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2 期　应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综述之四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主题研讨中，与会代表就“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相关问题发表了见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新的特点，也蕴含着巨大风险，需要推进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引领和推进国际关系变化。与会代表也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设立亚投行等给予了积极评价。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3 期　共同促进全球绿色增长——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综述之三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主题研讨中，与会专家就“全球治理”问题发表了见解。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个完整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包括中国，否则就不能够称之为多边的。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如果把力量合起来，无论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都将会走向成功。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4 期　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一综述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一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发表见解。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世界存在众多不平等，包括收入的不平等、不同国家话语权的不平等、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技术利用的不平等。造成当前全球众多不平等的原因复杂，有历史、地域、文化方面的，同时也有制度和政策安排上的。与会代表认为，解决当前全球不平等，一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二要通过改革和增加政府的转移支出，三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四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五要合作共赢、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实现包容性发展。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5 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要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入手——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二综述

【摘要】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二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发表见解。与会代表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至今，中国经济为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经济已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矫正经济再平衡要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入手，“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6 期　全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变革——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三综述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三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变革”发表见解。与会代表认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对各国能源政策、能源产业，甚至社会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各国政府必须联合起来解决能源问题。与会代表建议，中国应开展页岩气开发的国际合作，主导建立开展东亚能源部长级对话合作平台，积极扩大与周边国家电网的互联互通等，加强中国在亚洲能源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7 期　发挥智库作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四综述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四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智库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智库的机遇与挑战”两个议题发表见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智库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智库在当前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世界和中国发展迫切需要智库前瞻性的研究。参会代表还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8 期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努力打造中国品牌——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五综述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五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打造中国品牌”议题发表见解。与会代表认为，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品牌，对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是树立中国品牌的一个好机会，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打造国际品牌提供了重大机遇。中国品牌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持续的创新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延长品牌的生命力则需要企业发自内心的持续努力。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49 期　发挥市场作用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六综述

【摘要】近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专题论坛六上，来自各国的智库代表围绕“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市场的力量”发表见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市场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自贸区和金融创新改革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巨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市场必将为各国企业不断地创造出更多发展机遇。

[国际交流]

2015 年 5 月 23 日，曾培炎理事长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前产业经济大臣二阶俊博，就加强中日智库合作交换意见。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5 月 7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诺基亚全球执行副总裁巴里• 弗兰奇，就电信业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交流部、信息部陪同。

2015 年 5 月 25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澳洲国立大学 Peter Drysdale 教授，就双方开展中澳经济关系合作研究项目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5 月 14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全球 CEO 代表团一行，探讨中美医疗服务业发展相关问题。产业规划部、交流部、国经咨询公司陪同。

2015 年 5 月 25 日，张永军副总经济师会见巴基斯坦国家行政学院代表团，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我国经济形势等议题交换看法。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5 月 4 日，经济研究部会见新加坡驻华使馆二秘宋靖敏，探讨中新经济有关问题。交流部参加。

2015 年 5 月 11 日，交流部会见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董事总经理柯凯丽，就双方合作项目进展情况交换看法。

2015 年 5 月 12 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崔容敏，商讨双方下一步合作事宜。

2015 年 5 月 14 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摩根大通银行执

行董事李剑波，探讨双方合作事宜。

2015 年 5 月 25 日，经济研究部负责人徐洪才会见英国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总裁大卫•马什一行，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加入 SDR 等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交换意见。交流部参加。

2015 年 5 月 25 日，交流部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吴洪波助理杨琳，商讨吴洪波副秘书长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有关事宜。

2015 年 5 月 29-31 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赴俄罗斯出席俄罗斯国际关系委员会举办的“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变化世界中的新型伙伴关系”研讨会，并拜访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西北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等智库机构，商讨双方加强合作等事宜。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